

指尖上的“烟火”

洛水

父亲嗜烟。一辈子和烟形影相随，执烟的手，都磨出了茧，老而弥坚，金光灿灿。

父亲沉默寡言，最活泛的就是那身烟熏火燎味了，人未到味先闻。有事没事，都点一根烟，端坐在云雾里。他神色安宁、静穆，像得道的佛。母亲却见不得他抽闲烟，支派他干这干那。他不恼、不急，缓缓抽完最后一口，在地上摁灭，又生龙活虎，猴子出山一般。

儿时，父亲就是我心目里的齐天大圣。他指尖的烟犹如金箍棒，云里雾里，忽长忽短、变化多端。我心驰神往，鞍前马后地递烟、点火。然后，虔诚的道童般，看他悠然地

腾云驾雾。忽然，一声霹雳：你爷俩还不干活去！抽，就知道抽，过来我抽两巴掌……

不用看，也知是母亲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母亲就是父亲外的人 and 天，是那会念“紧箍咒”的唐僧。每此时，我都很没义气，脚底揩油，溜之大吉。若被抓住，就更没义气地控诉为父亲指使。父亲竟也自毁形象，辩称为我蛊惑。最后，各打三十大板，不了了之。

母亲的巴掌暴风骤雨，落在身上，却很轻。我和父亲相视一笑，信誓旦旦地悔过。但父亲从未真正悔过。母亲的“紧箍咒”，治标不治本，他总有应对的办法。母亲常感慨，父亲对烟的感情比对她还深！或许吧，在遇到母亲以前，他就已与烟相依为命多年。

那晚，马棚里，父亲刚写完作业，大伯摸进

来。父亲要去添草料，大伯制止了，递来一支烟。父亲怔住，望向大伯。大伯没说话，给他点上烟。父亲抽一口，呛得泪水涟涟。灯光昏暗，土墙上，兄弟俩的影子一片凌乱。第二天，父亲没有去上学，到生产队上工了。

那一年，爷爷奶奶相继去世。大伯要教书，二伯正读初三，家中需要人挣工分。

那一年，父亲十二岁。抽了烟，就算大人了，要担起大人的责任，也再离不开烟了。

父亲常说田里守夜的糗事。乌漆墨黑，他卧在草棚里，一根接一根抽烟。有时，过路的人会摸进来坐坐，借个火。父亲的光头锃亮，他们喊他大爷。父亲应着，只顾寒暄，也不管他们是人是鬼……。我听得毛骨悚然，父亲付之一笑。都过去那么久了，他还笑得那么孤独。

后来，有了母亲，有了管他的“咒语”，有了吵闹温暖的家……。但父亲仍离不开烟。

春节回家，一家人看《三打白骨精》。我说，孙悟空也是的！干嘛要听唐僧唠叨，八戒挑唆？一个跟头过去，取经还不分分钟的事。父亲笑笑：是呀，但然后呢？我说，就功德圆满了呗。父亲给母亲盖上棉袄——她又看睡了，接着讪讪道：但那一辈子该多无聊啊！

是呀！若母亲不唠叨，我不搅和，该多无聊啊！就像那些黑夜，父亲孤独地守着庄稼。

我给父亲点根烟。他指上的橙黄，像金箍，封存了多少时光？！父亲递过一根烟，我摆摆手。我的指上同样有个金箍——婚戒。尽管它们质地不同，但有着相同的承诺和希冀。

张燕峰

前天，哥哥在家人群里发了一段视频。画面上粉白的墙壁上妖娆着一朵朵小花，疏密有致，摇曳生姿，颇为动人。透过那扇窗，我辨认出这是母亲的房间。

半个月前，母亲去了姐姐家。想象一下，当母亲回到家里，看见焕然一新的房间，看到粉白的墙壁上盛开着的鲜艳花朵，会多么惊奇，多么欢喜。一想到母亲那既惊喜的神情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去年，父亲离开了我们。全家人都很悲痛，当看到白发如霜的母亲悲伤而落寞的神情，我们心中更是如针扎一般。现在，我们做的就是照顾好母亲，让她在失去伴

侣的孤独日子里安享晚年。这也是我们对父亲最好的报答，最好的怀念。

我说，妈，过去有爸爸的拖累，您哪里也去不了。现在，您有什么心愿，我帮您实现。

母亲略一思付，便开了口，有一个大表妹，30年没有见面了，不知是不是还活着？母亲微皱着眉头，眉宇间有着隐隐的担忧，也有浓浓的期待。

我马上拿起手机，给几个朋友打电话。几经辗转，终于打听到这个大姨还健在，住在邻县的乡下。

于是，我很快安排她们见了面。在去看大姨的路上，母亲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兴奋，急切且不停地问我，还有多少里？

这对30年没有见过面的老姐妹，见面后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聊着，似乎要把积攒多年

的话一下子向对方倾诉完。儿时温馨的时光，几十年的人事沧桑，酸甜苦辣，都在她们眼前闪过——时而热泪、时而叹息、时而大笑。

从大姨家回来后，母亲给健在的阿姨和舅舅们打电话，与他们一起分享与大姨相见的喜悦。

看着母亲兴致勃勃的样子，我说，妈，以后您想见谁，咱就见谁；您想去哪里，咱就去哪里。

母亲脱口而出，说想见你姑姑了，她腿脚不好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走路了。

姑姑是父亲唯一的妹妹，与母亲感情一向甚好，居住在大同市，算起来与母亲也有五六年没有见面了，难怪母亲思念她。

行，一定带您去大同！母亲咧着嘴笑着，那表情就像一个要求

得到满足的小女孩，道道皱纹舒展开来，眼眸中闪耀着明亮欢喜的光芒。

母亲已经86岁了，但我们每次给她买衣服都要买那些时尚的衣服。还没有入秋，我就给母亲买了一顶红色宽边棉布帽，还有一件银灰色的毛衣。母亲美滋滋的，在镜子前照了又照。

多漂亮呀，像一个美丽又时尚的老公主。老公主？老妖精还差不多。母亲说着，边忍俊不禁，拍着手大笑起来。

是的，自从父亲走后，我们把母亲当作公主来宠。家有老公主，让我们兄妹的心靠得更近，贴得更紧；时常隔着万水千山，在电话中商量怎么给母亲过生日，怎么给她制造意外的惊喜，怎么让她穿得更舒适，怎么满足她的心愿……

秋天

落在裙子上

吴赵男

风
穿过金色的海洋
微笑成星光
在四季吟一杯酒
微醺
写下秋天的诗行
落在裙子上

雨
抱紧风的记忆
在漫天雨雾里舞蹈
添一轮清凉的月
在半绿半黄间
洗去尘埃
与秋雨相吻

我
站在拐点处
与时间对坐
翻开心灵的扉页
用寂静
打开秋的裙摆



清气 孔祥秋 摄影

中关村往事

欧阳

消息说鼎沸中关村经年的鼎好电子商城关了。获悉此事，脑海中不自觉地就映出昔日繁华的画影，一时竟有些唏嘘。

鼎好大厦据称总商业面积有10万平方米，集中了全国各主流IT品牌和各种电子相关产品，有近2000多家商户扎根其中，可以说是北京乃至全国汇集厂商(品牌)最多、服务项目最全，展示、销售、服务集于一体的超大一站式电子主题商城。

曾经的中关村，除鼎好外，航母级的场所还有海龙、太平洋和科贸，以及附生的二手耗材市场。在其繁盛的时日，不仅每个市场内人头攒动，楼外穿行的人也是摩肩接踵。初时因为品牌电脑昂贵，各路自攒电脑的大使便蜂拥而至，与各色各样的经销商、代理商、批发商、零售商和快递运输

队伍一起，在黄庄以北、北京大学以南的中关村大街及其周边区域的每一寸土地上，一刻不停地留下重复踩踏的脚印。

对此，我有切身经历，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就是在海龙攒的。其后，自学“成才”的俺在近十年的时间里，先后自己动手攒过三台电脑，并有两次自主升级(换主板、CPU什么的)的体验。其中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好奇——想了解电脑，另一方面是对中关村市场的信任。

自己首次组装电脑很谨慎：托了个科贸里上班的兄弟带路。“你要什么配置跟他说。”没想到他把我带到一摊位后，扔下一句话就准备转身走人。这不会有问题吧？“不会！尽管放心。”接下来就是说我的电脑配置。摊主建议我换主板和机箱：“那款机箱电源有点紧张，主板兼容性不好。”新手我只能听之任之。随后没多一会儿，他就从不同摊位拿回了各种配件。熟练的他带着我不到两个小时就生产出了新电脑。从其间咱俩的对话中得知中关村是守信誉的，“旧货就是旧货，行货就是行货，没人骗你。”摊主说。

后来的实践印证了这一说法。

第二台电脑时，店家建议我拿便宜一两成的“水货”硬盘：“绝对没问题！有问

题你随时来随时换。”确实没问题。

随着业务熟悉，去中关村的次数有增，像主板、显卡升级什么的，有时候啥业务也不做也会去那里转转。再后来和海龙的一位小掌柜熟识地有了联系，再去市场都去瞧瞧他，多数时候要什么东西都让他帮我拿，也聊聊电脑的事儿。后来随着CPU接口的变换，我在他那儿攒了第三台电脑。没多久见度娘上说那批主板有问题，就给小掌柜去了电话，让他看看。“我给你送新的来，让送货的把原来那个带回来。”当天下午新主板就安装在了我的电脑里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大概有五六年吧？我想买台新的音箱，去了市场才发现卖相机、手机拉客的成了卖家的主力部队，而我要的音箱，相同品牌的产品各家报价差异居然很大。这让我困惑。一问小掌柜才知道彼时已非彼时。“现在假货多得狠。”他说，说是店家和人都换了不少，没换的也变坏了。你也变坏了吗？我问他，他没理睬我。

一年多以后，我有一次在书店看见U盘很便宜，买了一个，结果回来发现存不进东西，用软件检测，主控芯片全是乱码——显然是假货。看来还得麻烦小掌

柜。结果小掌柜那里拿回来的U盘一个熊样。“你得给我行货。”我电话小掌柜说。没两小时快递就来了，给了我三个一样样的U盘。怎么回事啊？小掌柜说钱不退了，你看哪个能用吧，他也被坑了。“从二级代理那儿拿的货，想不到他们也干这种事。”他说。

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，但此后我再也没进过海淀的电子(耗材)市场。

前阵子骑车路过中关村，发现萧条得不成样子，心里正想着或许也是疫情惹的祸。也是巧了，没两分钟就在黄庄路口碰到了住那边的教授兄弟，随口就问中关村怎么那么清静了。

本来人就不多，海龙关闭以后人更少了。教授说。

海龙关闭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

好些日子了……

有人说是线上买卖的风生水起，实体店难以为继，但也有观点认为陷阱太多太大，是大家伙合起来把自己个儿整坑里了。可能两方面原因都有吧。

不过，不管怎么样，曾经的时代巨幅风景，虽然拥有高科技的名号，但却一直难以去掉杂货铺的影子，这样的繁荣恐怕早晚都会谢幕吧。

鲁北

周末，我驾车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。途中，临近村庄的时候，看见近处的路边、或不远处的庄稼地旁，有大片的野草，绿油油的，被风一吹，摇摇摆摆，没了魂儿似的。我大发感慨，对坐在身边的妻子说，那时候，怎么没有这么茂密的野草呢！

那时候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对野草情有独钟，田间蔓草，就是我少年时的情人。

那时候，我十二三岁，弟弟八九岁。放学后，或者节假日里，我们的主要任务，就是割草。似乎村里长大的孩子，都有割草、剥菜的经历。大约半个小时，我们可以割十几斤青草，大都是茅草或蔓蔓草，捆起来，背回家。

从夏天到秋天，我们几乎天天重复这样的劳动。

有时候，我们也给生产队里割草，生产队里养着牛、喂着马，靠着这些大牲畜犁地、拉车。

家庭妇女也忙里偷闲，去割青草。

住在我们西南角的李姓人家，娶了外县的媳妇，长得有几分姿色，常常引得村里的小伙子们神魂颠倒，见到时，总会多看几眼。我们的小村，远离县城，是一个十分闭塞的小村，难得见到这样一个杨柳细腰、错落有致的女子，特别是一根长长的大辫子垂在腰际，韵味十足。她也割青草，割得并不多，却比我们的斤两重。我发现，她的草里不干净，常常有土坷垃混在里面。从此，我感觉她没有以前美了。

在乡下，中小学生一年放三次假，暑假、秋假、寒假，不放暑假。麦假时间短，我大都帮着父亲收小麦。秋假时间长，我在帮着父亲侍弄庄稼的同时，也割草，但主要是割草。能割草的地方并不多，也就是庄稼地边，水沟旁，或者撂荒地里。那时庄稼长得不好，草也不茂盛，割草，是我犯愁的事儿：割是一个方面，草是一个方面。草被生产队的牛、羊无数次的践踏，很难找到成片的草，茂盛的草。

有一年，我们割的草，晒干了，垛起来，像两座山。入冬的时候，父亲把那些草卖了。用卖草的钱，买回来200斤粮食，我们全家人吃了一个冬天。

那时候的草，十二三岁。那时候的我，也是十二三岁。

如今，路边、沟旁、地沿上的那些草，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。但看到那些草，我还是心怀欢喜。

心头那双草鞋

陈 雨

早年的农村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草鞋。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出生在南方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那时无论男女老少，不分晴雨霜雪，村民外出干活都穿着一双草鞋。

像许多的农村孩子一样，我对草鞋有一种本能的抗拒。孩子细皮嫩肉的穿着硬邦邦的草鞋，一双小脚丫总是被晒得满是血泡，火辣辣的痛，我是宁愿赤脚也不愿穿草鞋的，觉着赤脚比穿草鞋来得自由舒适。

父亲最大的愿望是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好农民，他觉得这是一个父亲的本分，做农民就要从穿草鞋开始，什么时候学会穿草鞋了，儿子就像个农民了。

父亲给我做草鞋时特别用心，精心选择一捆稻草反反复复地捶打，有时还会掺和一些碎布条，尽量把草鞋做得柔软舒适一些，他把对儿子的全部希望揉进了一双草鞋。不过穿上草鞋我还是会发怵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是能不穿草鞋就不穿草鞋的。

像所有母亲都要教会女儿做布鞋一样，我十来岁的时候，父亲就开始教我学做草鞋了，父亲觉得做草鞋如同耕田、插秧一样，是农民的看法功夫，一个人做不好草鞋，儿子连同父亲都会被人瞧不起的。

做草鞋的难度是要把草绳搓得匀称、编得紧密，草鞋要做得大小适中，契合脚的模样，并在草鞋的边沿分别对称编出六个襻(纽)，便于穿一根绳子牢牢缚住脚板，一双精巧的草鞋其实也是充满灵气的。

我从小有些笨手笨脚的，草鞋做得松松垮垮的，几个襻也做得东倒西歪，做出来的草鞋都是次品，上不了脚。可父亲还是极其耐心手把手地教我做草鞋，一次又一次，他真心想把自己的好手艺传授给我。做得多了，我就喜欢上草鞋了，这大概算一种日久生情吧，草鞋成了我心头的一种牵挂。不过后来我开始认真读起书来，再也没有做过草鞋。

去大学报到的那天，母亲为我准备了一大箱日用品，表哥把那双结婚时才穿过一次的皮鞋送给了我，父亲默默地把我送上火车，临走时父亲摸摸我的头说，老爸只送你一句话，以后穿了皮鞋也不要忘记你穿过草鞋，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农民的儿子。

草鞋是我们老祖宗的一大发明，据说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。草鞋，最早的名字叫“屨”，相传为黄帝的臣子不则所创造，但我坚信草鞋是农民集体智慧的结晶。

现在的农村什么都不缺，就是缺草鞋。即使在山区农村也很难再见到有人穿草鞋了，琳琅满目的鞋子反映出今天我们物质生活的富庶多彩。而草鞋成了某些博物馆、农家乐的一种装置，或者某些时装发布会的点缀，透析出当代人一种崇尚怀旧的心理，虽然有些突兀、有些违和，但是见到几乎销声匿迹的草鞋，我总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、亲切感，总觉得有一缕草木、泥土的芬芳从心头飘过。

在日益返璞归真的今天，原始、朴实、粗陋的草鞋会不会卷土重来？谁也说不上。



秋色

郭建良 摄